

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Hippolyte Taine

现代法国的起源：
大革命之大混乱

II

[法]伊波利特·泰纳 著

黄艳红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现代法国的起源： 大革命之大混乱

〔法〕伊波利特·泰纳 著

黄艳红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法国的起源：大革命之大混乱 / (法) 泰纳著；
黄艳红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12

(史家名著书系)

ISBN 978-7-5534-6154-0

I. ①现… II. ①泰… ②黄… III. ①法国大革命—
研究 IV. ①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4252号

现代法国的起源：大革命之大混乱

著 者 [法]伊波利特·泰纳

译 者 黄艳红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 划 编辑 刘训练

责 任 编辑 崔文辉 张春峰 张文亭

装 帧 设计 未 淇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21.25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 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269

发行部：010-63104979

官 方 微信 hand-read

邮 箱 jlp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534-6154-0

定 价：58.00元

作者序^①

《现代法国的起源》第二部分将包括两卷：群众暴动和制宪议会的立法最终摧毁了法国一切形式的政府，这是该卷的主题；围绕一种极端理论形成了一个党派，它攫取了权力，并按照这个理论行使权力，这是下一卷的主题。

应该还有第三卷，用以批判这些现象的源头；但我没有这个机会：我只会讲述我所看到的规则性现象。最可信的证据总是目击者的证据，尤其是在证人为人正派，认真专注，头脑聪明时；在他即时按事件本来面目就地记录时；在其唯一的目的明显在于保存或提供资料时；当他的著作并非出于某种事业的需要而写成的论战之作、或面向公众的雄辩辞章，而是一篇司法陈词，一部秘密报告，一份机密函件，一封私人信件，一本个人记事本时。一份文献越是接近这种类型，就越值得信赖，越能提供更出色的素材。我已在国家档案馆发现了很多具有这一优点的材料，主要是大臣、督办、助理督办、法官和其他官员、军事长官、军队指挥官和警察官员、议会和国王的特派员、各

^① 该序言为八开本的卷首，但与泰纳最初的设想不同，这一部分有三卷而不是两卷（编者注）。

省区和市政机构^①官员的手稿通信，以及个人给国王、国民议会和大臣们的手稿信件。他们中间囊括各色人等，其地位天差地别，教育背景和政见也是形形色色。他们的人数数以万计，数以千计，分布在地球表面的各个角落。他们都是单独写下这些文字，无法协调一致，甚至彼此之间都不认识。若论收集和传递准确的信息，没有人比他们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他们当中没有人追求文学效应，甚至没有想过自己的文字能出版。他们的记录非常及时，对当地发生的事件有直接印象。这是首选和第一手的证据，我们应依据它们来检验所有其他资料页面底部的注释将指明这些具有决定意义的证人的身份，职位，姓名和住址。为进一步确保真实性，我将尽可能地记录他们的原话。这样，读者在面对文本时，就可以自行解读，并可以得出自己的看法；读者将和我对同样的文献进行总结，而且可以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如果他认为合适的话。如果他觉得文献中有暗藏的意义，那是他自己的阐发，如果 he 要对文献作进一步探讨，那也是他自己的事情。在我看来，过去有它本身面貌，而这幅画像只能跟过去的法国相像。我在描绘这幅画像时，并不关心我们当下的论争；我写作时就像在阐述佛罗伦萨和雅典的革命一样。这是历史，仅此而已；说到底，我对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的职业看得太重，以致在自我隐藏之后不可能成为别的角色。

① 法国的基层行政单位是 *commune*（社区），其管理机构统称为 *municipalité*，即市政当局或市政府，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用这个术语。所以，译文中提到市政当局或市政府时，同样适用于农村的社区管理机关，而不仅限于城市。——译者

目 录

作者序

001

第一卷



第一章 混乱的开始	003
第二章 七月十四日之前的巴黎	022
第三章	051
第四章	080

第二卷



第一章	107
第二章 毁灭	133
第三章 建设—1791年宪法	180

第三卷



第一章	209
第二章 主权者：不受约束的狂热	237
第三章 统治欲望的发展	283

第一卷

本能的混乱



第一章 混乱的开始

I. 首要原因，饥荒—歉收—1788—1789年的冬天—面包价格腾贵，质量低劣—外省—巴黎。II. 第二个原因，希望—政府机构的分裂和懈怠—地方议会调查—人民意识到自己的状态—召集三级会议—希望之诞生—最初的大会与最初的动乱巧合。III. 1789年头六个月的外省—饥荒的后果。IV. 流浪汉和盗匪的介入。V. 新政策的后果。VI. 普罗旺斯的首次农民暴乱—镇压的绵软与无效。

1789年7月14—15日夜间，拉罗什福柯-利昂库尔(La Rochefoucauld-Liancourt)公爵叫醒路易十六，告诉他巴士底被人攻占了。“那么这是一场叛乱啊。”国王说。“不，陛下，”公爵答道，“这是场革命。”事情比这还要严重得多。权力不仅已从国王的手中滑落，而且根本没有落到议会的手中；它掉在了地上，落入失控的民众之手，这些人(foule)成群结队，激烈狂暴，亢奋异常，他们拿起了权力，就像捡起一件丢弃在街道上的武器。实际上，政府已经不存在了；人类社会构建起的大厦轰然倒塌，人们回到了自然状态。这不是革命，而是一次解体(dissolution)。

I

两个原因引发并延续着普遍的骚乱。第一个原因是饥荒，它是长期性的，十年间一直绵延不绝；饥荒引起暴力，而暴力又加剧饥荒的后果，终于将群众的种种狂热放大为一场疯狂，并使得大革命的全部历程成为一连串痉挛式的错误步伐。

当一条河流的洪水快要漫过堤坝时，一次微弱的涨水就能造成决堤。这就是18世纪的苦难局面。面包价格便宜时，平民百姓勉强为生，价格贵时，死亡便是真切的威胁。这种焦虑之下，动物的本能开始反叛，构成公共和平的普遍服从，取决于干与湿、冷与热之间一分一毫的增减。1788年十分干燥，农业收成很不好；另外，在收割季的前夕^①，一场可怕的冰雹袭击巴黎周围地区，从诺曼底直到香槟，方圆60法里的最肥沃的地区遭受毁灭性打击，损失达1亿。当年冬天之严酷为1709年以来所仅见；12月底，塞纳河自巴黎到勒阿弗尔封冻，温度计显示的气温为零下18.75度。普罗旺斯1/3的橄榄树死亡，剩下的受创甚深，估计两年内颗粒无收。甚至在朗格多克，情况也是灾难性的；在维瓦莱，在塞汶山区，成片的栗树林死亡，山区的所有小麦田和饲料场全都毫无收成；在平原地带，罗讷河干涸见底长达两个月。1789年春天起，饥荒随处可见，而且，随着水位上涨，饥荒还在逐月加剧。政府命令农户、地主和商人供应市场，对进口给予双倍的补贴，并费尽心机、不惜负债而花费4000万进口小麦以供应法国，但一切努力都归于徒劳。个人，如大贵族、大领主、主教，以及各主教座堂和各个社区，纷纷进行施舍救济，巴黎大主教为此借了40万利弗尔，有个富人在冰雹次日发放了4万法郎，有个圣贝尔纳修道院养活

① Marmontel, *Mémoires*, II, 221. – Albert Babeau, *Histoire de Troye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I, 91, 187 (特鲁瓦市长Huez的信件，1788年7月30日)。— Archives nationales, H, 1274 (M. de Caraman的信件，1789年4月22日)。H, 942 (朗格多克三级会议的陈情书)。Buchez et Roux, *Histoire parlementaire*, I, 283.

1200名穷人达六周之久^①；所有这些仍是徒劳。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无论是公共应急机构，还是私人慈善行为，都不足以应付如此巨大的需求。在诺曼底，最近的商业条约^②已经让纺织厂和花边厂陷于破产，4万名工人失去工作；与此同时，在为数众多的教区，1/4的居民靠乞讨为生。在这些地方，“几乎所有的居民，甚至包括佃农和地产主，都在吃面包，喝凉水”；在另一处，“很多不幸之人吃的是燕麦面包，有的人竟吃粘土，这造成好几个孩子死亡”。鲁昂高等法院写道：“首先要救济奄奄一息的人民……陛下，您的大部分臣民买不起面包，而买到面包的人拿到的又是什么样的面包呢！”当时正在法国各地旅行的阿瑟·扬（Arthur Young），所见所闻全都是面包价格昂贵，人民处境悲惨。在特鲁瓦，面包每斤（livre）4个苏，即相当于今天的8个苏，而失业的手工业者大批涌向慈善救济工场，那里他们每天只能挣12个苏。在洛林，所有观察者都注意到，“半数的百姓在忍饥挨饿”。在巴黎，赤贫者的数量增加了两倍；仅圣-安托万郊区就有3万之众。巴黎周围一带粮食欠缺，或者庄稼被毁^③。在7月初的蒙特罗（Montereau），市场上已是空荡荡的了。如果政府官员不将面包价格提到每斤5个苏，“面包师就不会烤面包”；督办能够送来的黑麦和大麦“质量低劣之极，腐烂变质，有时还会引起危险的病症；但大部分贫苦消费者被迫忍受这种窘境，他们只能利用这种劣质谷物”。在维伦纽夫-勒-鲁瓦，市长写道，“最近两车黑麦是一匹羸弱的马送来的，黑得不加小麦就无法零卖”。在桑斯，助理督办提供的面包品质极差，大麦“发出一股臭味”，卖者于是将这种劣质面包送到助理督办的鼻子底下。在谢弗鲁兹，大麦发芽，有股恶臭味道，但一位官员

^① *L'Ancien régime*, liv. I, Chap. I, ii. – Albert Babeau, I, 91 (特鲁瓦主教捐出1.2万法郎，主教座堂教务会捐出6000法郎，以支持慈善赈济活动)。

^② 指1786年法国同英国签订的商业条约，英国廉价的工业品大量进入法国市场。—译者

^③ Buchez et Roux, IV, 79 à 82. (1789年7月9日Montereau的行政机构的信件；7月10日Villeneuve-le-Roi市长的信件；7月10日M. Baudry的信件；7月11日M. Jamin的信件；7月11日M. Priorau的信件等。) Montjoie,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France*, 2^e partie, ch. XXI, 5.

说道，“饥肠辘辘的可怜人只能拿它充饥”。在枫丹白露，“黑麦——占到口粮的一半——产出的麸皮多于麦粉”，为了用它制作面包，不得不“进行数次研磨加工”。即使是这样的面包，人们也是唯恐求之不得：“最后只能通过小窗口来分发”；那些费尽力气领到配给的人“经常在途中受到攻击，被更强壮的饥民抢劫”。在南日斯，“法官们禁止同一个人在同一市场上购买食物超过两斗”。总而言之，生计物品如此稀缺，以致人们不知道如何养活士兵；军事大臣连发两封急件，要求在收获季节到来前收割2万塞提埃(*setier*)^①黑麦。就算是一派太平景象的巴黎，仿佛也是在漫长的围城后期实行配给制的饥饿之城，1870年12月的饥馑及生计之悲惨，也不及1789年7月严重和恶劣。

一位目击者说^②，“越是接近7月14日，饥荒越是严重。每个面包店都被人群包围着，人们极尽吝啬地给他们分发面包……面包普遍都是颜色发黑，沾满泥沙，味道苦涩，能让人喉咙发炎，肠胃生疼。在军事学校和其他的货栈，我看到的面粉质地吓人，有些面粉凝结成黄色的块状物，恶臭熏人，而且这种面粉块硬度惊人，需要用斧头反复劈砍才能破开。我自己为弄到这种可怕的面包历尽艰难，这本已让我心生反感，而给我分发这种客饭的人员更是令人生厌，我决心拒绝这种食物。晚上，我前往加武咖啡馆，幸好那里有人给我留了两块叫做笛子的小面包，这就是整整一个星期我吃到的全部面包。”但这种资源只有富人才能享受。至于小民百姓，要想吃到喂狗的面包，得排上好几个小时的队。人们在队伍中相互厮打，“争抢食物”。由于新增了排队这项麻烦，“工场里的人都跑光了”。有的时候，工人在等待一天之后，两手空空回到家中，如果他能带回一个四斤的大圆面包，那得花费3法郎12苏，12苏用来买面包，3法郎是旷工一天的代

^① 塞提埃既可指容量单位(约合150升-300升)，也可指这一单位的种子所能播种的土地面积。一译者

^② Montjoie, ib., ch. XXIX, V, 37. – E. et J. de Goncourt,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pendant la Révolution*, 53. – Déposition de Maillard (夏特莱关于10月5日和6日事件的刑事报告)。

价。躁动不安、无所事事的人群排成长队，在面包店门口徘徊，非法的念头就从这里酝酿出来；如果今晚面包师傅没有面粉烤面包，明天我们就要饿肚子！这是一种可怕的想法，要对付它，政府动用全部的力量都不嫌过分；因为，唯有力量，武装的、现成的、可见的、气势汹汹的力量，才能在饥饿之中维持秩序。在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代，忍饥挨饿的情形更为常见，但骚乱都被无情而迅速地镇压，而且只是局部和短暂的动乱。叛乱者被绞死，其他的人被发配做苦役，农民和工人很快就深信他们无能为力，只能默默地回到摊位和田间。当围墙太高时，人们甚至想不到去翻越它。但这时的围墙开始爆裂，所有的看守，如教士，贵族，第三等级，文人，政治家，甚至政府自己，都在墙上凿出了大豁口。处境悲惨之人第一次看见了出口；他们先是小队冲锋，然后是大集群地冲击，于是叛乱遍及所有地方，就像从前的逆来顺受一样普遍。

II

正是通过这个豁口，希望像一束光一样射了进来，并一点一滴地渗到了最底部。半个世纪以来，这束光越来越亮，它首先照亮的是大厦顶层漂亮公寓中的上层阶级，接着光线射向大厦中层和底层的市民阶层，最后两年渗入人民劳作的地窖，直至最幽深的渊薮和最偏僻的角落——在这些地方，各种不轨之人，如流浪汉、罪犯，大批卑劣的暴民在逃避法律的追究，其数目在与日俱增。1778和1779年，内克（Necker）设立了最初的两个省议会，1787年，罗梅尼·德·布里安（Loménie de Brienne）又增加了19个；每个省议会下面设区议会；每个区议会下面设教区议会^①，因此整个行政机器都变了。这些新议会负责摊派和征收税款，它们决定并领导所有的公共工程，将对大部

^① Tocqueville,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272-290. – Léonce de Lavergne, *les Assemblées provinciales*, 109. – *Procès-verbaux des Assemblées provinciales, passim.*

分争议作出最终裁决。督办、助理督办、税区官员(*élu*)因此失去了四分之三的权威。然而，这两种界限不清、相互竞争的权力机构之间发生了冲突；指挥权摇摆不定，服从精神日渐消退。臣民再也感受不到肩膀上那只手的支配性的重压，唯有这只手能排除任何可能的干涉和抵制，让臣民弯下腰，给他推动力，使他前行。但是，在每个教区、区甚至省议会上，与领主和高级教士平起平坐的有很多平民，他们是“农夫”，而且经常还是普通佃农。他们听说税收数额巨大，并记住了具体数字，这些税完全或几乎完全由他们支付，如军役税、军役税附加、人头税、道路捐税，等他们回家时，肯定会向邻居们讲述这些。所有这些数字都被印刷公布；乡村讼师按自己的习惯进行推理，工匠和乡民星期天出门望弥撒，或者晚间聚在客栈的大厅里。在这些地方，密谈被允许，这是自上而下被激发起来的。1788年的最初几天，各省议会要求各教区的代表和居民进行地方调查：人们想知道居民冤情的细节，每种税收抽取了他们多少收入，农民的支出和苦楚，教区有多少特权者，他们的财产状况如何，如果他们住在当地，他们免除的税收共计多少；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手握羽毛笔的乡村诉讼代理人掰着手指列举每个特权者，抨击他的生活派头，估算他的财产，掂量他的豁免权给村子带来了多大的不幸，痛骂税收和税吏。离开议会之后，村民长时间地回味他刚刚听到的东西。他看到了自己的不幸，不是像以前那样零星的不幸，而是所有的不幸，它们跟其同伴所忍受的无边无际的苦难交织在一起。接着，他开始理解这种不幸的根源。国王是好的，但为什么他的税吏要拿走我们这么多钱呢？议事司铎或领主大人之类的人物，也算不上坏人，但他们为何要凭地位让我们交钱呢？请设想一下，一头拉车的役马突然得到一束理性微光的启迪，发现了人类和马类之间的对立；请您尽力想象，这役马瞬间获得了一些新观念，首先是意识到，车夫和驭者束缚它、鞭打它，接着它发现，车上那些仁慈的旅客和富有同情心的贵妇虽然很可怜它，但他们不仅给它套上车子，还将自己全部的行囊和体重搬上了车子。

同样，在农民中间，朦胧的空想渐渐地酝酿出一种新的观念，即他们是受压迫的大众中的一员，他们大批的同类散布到天际的尽头，人人都受到虐待，都在挨饿，都备受盘剥。到1788年底，在督办们和军事指挥官们的通信中，人们可以辨识出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的沉闷但随处可闻的隆隆声。人们的性格似乎在改变，他们显得敏感又倔强。就在这个时候，政府放松了缰绳，让他们自行其是^①。1787年11月，国王宣布他将召集三级会议。1788年7月5日，他要求所有团体和有资格的个人就这个问题向他提交报告。8月8日，他确定了会议日期。10月5日，他召集显贵们商讨此事。12月27日，他同意第三等级代表人数翻番，因为“其理由与慷慨的情感紧密相连，而且公共舆论将始终会支持”。同一天，他在教士选举大会中确立了教区神父的多数派地位，“因为这些善良而有益的神父日复一日地贴近和关怀人民的困苦并帮助人民，因此他们最为真切地了解人民的不幸和需求”。1789年1月24日，他规定了会议的程序和形式。从2月7日开始，召集会议的信件一封封地发出。八天之后，每个教区都召开大会，起草陈情书，会议因为书面表述和列举的各种不幸的细节而变得群情激昂。所有呼吁和条文都像冲击波一般回荡在民众的脑海中。条文有言，“陛下希望，他王国最边远的角落、最不为人知的居民，都能确信其愿望和要求可蒙陛下听闻。”因此事情是真的，确定无疑。人们邀请百姓发言，请他们前来，同他们商议，减轻他们的负担。从此他们的不幸将缓解，美好的时光即将到来。除此之外他们就一无所知了；因此，几个月后的7月份^②，一个农妇给阿瑟·扬的全部回答只能是这样的：“有人对她说，有些富人想为像她这样不幸的人做些什么。”但是，这些人是谁，究竟要做什么，怎么做，她都不知道：这对她来说太复杂了，其迟钝麻木的头脑理解不了。这样的头脑只能抽象出一种观念：即刻减轻负担的希望，他深信这个要求是正当的，

^① Duvergier, *Collection des lois et décrets*, I, 1 à 23, 尤其是第15页。

^② Arthur Young, 12 juillet 1789 (香槟)。

并决心以一切方式协助之，焦虑的等待过后，他时刻准备发起冲击，紧张的意志越发僵硬，只等着有个机会在行动中尽情放纵一下，就像一支无法回头的箭，射向一个陡然之间突然揭开面纱的陌生目标。饥饿一下子就让他们找到了目标：市场上应该有小麦；佃户和地主应该将小麦运到市场上；大买主、政府和少数人不应该把小麦运往别处；小麦应该低价出售，应该核定价格，面包店老板应该以两个苏一斤的价格销售；谷物、面粉、葡萄酒、盐、粮食，都不应成为课税对象；不应该存在捐税，无论是领主捐、教会什一税，还是国王和市政当局的税收。于是，从这个观念出发，3月、4月和5月，各地纷纷发生骚乱。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这样的祸患^①；根本不能理解，无数的罪犯在无人带领的情形下，竟能串通一气，到处犯下同样的暴行，而且就在三级会议即将开幕的时刻”。这是因为，在旧制度时代，火灾已在封闭的门后面酝酿；当这扇大门敞开、空气涌入时，火苗立刻窜了起来。

III

起先这只是些间歇性、孤立的火苗，已被扑灭或自行熄灭；但片刻之后，在同一地点或在其旁边，劈啪的燃烧声再度响起，这种声音的蔓延和重启，表明燃烧物广大而深厚，它在逐步加热并将发生爆炸。在巴士底风暴来临前的四个月中，法国共发生了三百多起骚乱。从普瓦图、布列塔尼、都兰、奥尔良、诺曼底、法兰西岛、皮卡迪、香槟、阿尔萨斯、勃艮第、尼维尔内、奥弗涅，到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每个月、每个星期都在发生暴乱。5月28日，鲁昂高等法院通报粮食被抢劫，“混战厮打十分激烈和血腥，两边都有很多人死去”，骚乱遍及全省，如卡昂、圣洛、莫尔旦、格朗维尔、埃弗勒、贝尔奈、彭奥德梅

^① Montjoie, 1re partie, 102.

尔、埃尔贝夫、卢维耶，以及其他地方。4月20日，中央各省的军事指挥官贝桑瓦尔男爵写道：“我向内克先生重申，都兰和奥尔良的境况糟糕之极；这两个省寄给我的每封信，都在讲述三四起骚乱的细节，军队和骑警费尽力气才控制住局面”^①。——在整个王国，类似的景象随处可见。

一般来说，妇女在骚乱中起了带头作用，仿佛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在蒙莱里，正是妇女用剪刀割破粮袋。每个星期的集市日，当得知大圆面包从三个苏涨到四个苏，接着又涨到七个苏，她们愤怒地高声喊叫：她们男人挣的薪水太少，开工又不足^②，面包价格这么高，如何养家？人们聚集在粮库和面包店门口；叫喊声詈骂声在人群中催生了一股冲动；店主或商人被推搡倒地，店铺被冲破，粮食落入买主和饥民手中；每个人都自顾自地抢粮，有的给钱有的不给钱，然后带着自己的战利品逃之夭夭。有时这是预先串通好的行动^③。5月1日，在塞纳河上的布莱耶，方圆四法里的村民，为数4000之众，以石头、刀子、棍棒为武器，强迫运送粮食的农民以每斗3利弗尔、而非4利弗尔10个苏的价格销售，并威胁在下一次集市上继续这样做，于是农民不敢前来，市场空无一人；除了当地居民，甚至连当兵的都被抢劫。在朗格多克的巴尼奥尔，4月1日和2日，手执木棍的农民听到鼓声后聚到一起，“在城里到处游走，若不给他们小麦和钱财，便以纵火和流血相威胁”；他们闯入居民家中寻找谷物，并低价私分，“承诺下次收成时付钱”，他们还强迫市政官把面包价格降为每斤2个苏，每日劳动的工价涨到4个苏。而且，这是最常见的做法：人民不再服从权威，而是权威服从人民。市政官、市政议员、市长、管事等官员，在无边无际的骚乱面前手足无措，虚弱无力；他们觉得自己快要被踩在脚下、被人扔出窗外。另一些人要稳重一些，他们知道，聚众造反是疯

^① Floquet, *Histoire du parlement de Normandie VII*, 508. – Archives nationales, H. 1453.

^② Arthur Young, 29 juin (南日)。

^③ Archives nationales, H. 1453. Bray的领主 Mortemart公爵的信件，5月4日；朗格多克督办 Balainvilliers的信件，4月15日。